

中国就业结构转变 与城市化

◎ 田明 /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

田 明 著

本书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60400127)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就业结构与城市化二者关系演变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城市化的专著。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综合评价及对相关统计指标和概念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本书分析了中国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演变的历史过程及特点,比较了不同时期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差异,以及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在详细比较了先进工业化国家和世界一般模式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周期演变规律,比较了中国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周期变化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就业结构偏差和城市化偏差的实质和根源。运用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了衡量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标准模式,并以此为尺度,以影响中国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的主要因素为线索,把中国 31 个省(不含台湾省和港澳地区)、自治区、直辖市分成 5 种类型,并对其中的 3 种典型类型进行了案例分析。

本书可供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人员和高校师生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田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3-021114-9

I. 中… II. 田… III. ①劳动就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②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F249.2 F2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550 号

责任编辑:赵 峰 朱海燕 沈晓晶 / 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王 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1/4
印数:1—3 000 字数:261 000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前 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社会经济急剧转型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其中,两个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化是人口的城乡结构变化——即城市化和就业结构变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和就业结构转变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互动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对于就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演变过程、演变规律和内在机制的研究却并不多。多数研究一般性地视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把这作为不需要证明的结论加以接受。其实,深入分析这些看似密切而简单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些很重要的规律,这些规律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所差异,并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和支配。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把中国城市化和就业结构转变与工业化先行国家城市化和就业结构转变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始终把发展的阶段性和中国巨大的区域差异性相结合,始终关注不同规模城镇的不同特点。从研究重点来看,主要包括:①揭示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过程;②研究影响就业结构转变和城市化关系的机制和因素,归纳不同因素对就业结构和城市化关系影响的方向和程度;③提出标准的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模式 and 对比参照依据;④研究就业与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发展路径及其影响因素。

本书具体结构和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从理论上界定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概念以及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第二章,对不同口径数据的应用价值和适用范围进行界定,提出界定城镇人口和城镇地域的标准;第三章,分析我国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过程、特点及其背景;第四章,我国就业结构偏差与城市化偏差的判断与原因分析;第五章,分析我国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区域格局及其演变过程;第六章,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关系演变的规律和特点;第七章,分析影响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的机制和因素;第八章,三种典型区域的案例分析;第九章,结论与展望。

作 者

2007年12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一、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研究的地理视角	1
二、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关系	2
三、相关研究评述	8
第二章 城镇人口和城镇地域的界定	14
一、市镇设置标准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变化	14
二、城镇地域与城镇人口界定	19
第三章 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25
一、改革开放前的制度环境与发展过程	25
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环境与发展过程	30
第四章 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偏差的判断与分析	38
一、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偏差的实质	38
二、就业结构偏差的变化及特点	42
三、就业结构偏差的原因分析	49
第五章 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58
一、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区域格局变化	58
二、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分类	67
三、非农化与城市化区域差异系数的变动	69
第六章 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化	73
一、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的演变规律	73
二、我国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变化的特点	81
三、我国城市化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区域比较	84
第七章 影响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	95
一、乡村工业化	95
二、城镇失业	99
三、人口迁移	101
四、大中城市人口非正式迁移与城市化	106
五、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重点	113
第八章 典型区域案例分析	122
一、乡村工业发展地区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	122
二、农业发展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	131
三、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基地)城镇失业与城市化	139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147
一、主要结论	147
二、展望	151
主要参考文献.....	154
附录.....	159
后记.....	172

第一章 绪 论

一、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研究的地理视角

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包括两个方面:格局和过程。所谓格局是指空间结构的格局,空间结构是由不同社会经济“疏”和“密”的带状和面状地域组成的(陆大道,1995),以空间结构分析为基础形成的空间组织理论,旨在揭示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空间分布与空间相互作用规律,是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樊杰等,2001);空间分布的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演变过程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过程之一。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变过程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和结构变化过程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区别仅在于所研究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长期以来,地理学、区域科学等学科在关注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化过程的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结构变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空间和区域视野里的城乡结构变化——即城市化,已成为地理学分支学科城市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经济学虽然长期以来忽视经济活动的“空间”(Krugman,1991),但作为经济发展诸多结构性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城市化过程一直受到发展经济学的关注。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经典定义,经济发展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经济产出、人均产出的增长过程,通常用人均 GDP 或人均 GNP 等来表示;另一个是结构变化,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各类产业的组成、劳动力行业分布以及各类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等各个方面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Chenery et al., 1975),“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外,还应包括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吉利斯等,199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Chenery 根据对 100 多个国家经济发展轨迹的考察归纳出 10 个基本的结构变化过程。其中,劳动力的行业分布和人口的城乡分布(城市化)是两个基本的结构转变过程。虽然“空间”和“区域”没有清晰地、具体地出现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里,但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关于国别比较的研究已经深深打上了空间和区域的烙印。

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不同科学理论之间融合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实践发展的推动。目前,我们已经很难从研究内容上对某一研究成果做出学科性质归属的判断。要想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更加准确和全面地解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要求每一门学科必须敞开大门,破除门第之见,吸纳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互相借鉴,相互促进。现代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关注空间和区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对经济地理学进行批判和吸收的基础上,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区域问题,积极倡导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新经济地理学。此后,他与日本学者藤田昌久等合作,在 2000 年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空间经济学》,空间已经完全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Fujita et al., 2000)。

就业与就业结构并不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以系统性研究作为主要学科特点的地理学在研究城市化及城乡结构转变的时候,无法回避就业结构问题。因为,就业结构的转变与城市化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没有就业结构的转变,城镇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城市化进程,城乡结构的转变也无从谈起。就业结构的转变是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结果,进而引起人口的空间位移,促成了城市化的发展。这两个过程相互联系,恰好切中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结构演变与空间变化。

二、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关系

1. 就业与就业结构

目前各国的就业标准及就业的定义并不一致。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看法一致,即:实现就业的人是:①符合一定年龄阶段的要求;②有获得报酬或经营收入;③有职业并在工作;④在规定的调查时间内工作一定时间以上。在年龄问题上,各国标准不同,比如日本从15岁开始计算,美国从16岁开始计算,而菲律宾则从10岁开始计算。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劳动年龄人口为16~65周岁。对于收入和报酬,美国规定农场主或业主的家属,虽然不领取报酬,但在家协助工作,一般每天工作1/3以上时间者,称作家庭从业人员或家属工人,算作就业;日本规定业主或农场主自己不工作但其雇员和家属等工作,也算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就业(employment)是“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据ILO的标准,在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可以归为三类:就业者、失业者和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者是指那些在过去一周内从事了至少1个小时有收入的工作或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的人(OECD,1987,1995)。我国关于就业的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基本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就业人口是指在参考期内(一周内),为金钱或物质报酬、利润或家庭收入而工作至少1小时的劳动年龄人口(男15~60周岁,女15~55周岁),包括被雇佣而没有上班,但与雇主保持正式联系和拥有1家公司但因特别原因暂时没有上班的人口。失业者是指那些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非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有劳动能力,而不愿就业的人口。据此,把有关就业的几个主要概念分别总结如下:

$$\text{总人口} = \text{劳动年龄人口} + \text{非劳动年龄人口}$$
$$\text{劳动年龄人口} = \text{劳动力人口} + \text{非经济活动人口}$$
$$\text{劳动力人口} = \text{就业人口} + \text{失业人口}$$
$$\text{就业率} = \text{就业人口} / \text{劳动年龄人口} \times 100\%$$
$$\text{失业率} = \text{失业人口} / \text{劳动力人口} \times 100\% = \text{失业人口} / (\text{就业人口} + \text{失业人口}) \times 100\%$$
$$\text{人口就业参与率} = \text{就业人口} / \text{总人口} \times 100\%$$

就业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性质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构成比例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总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具有不同的就业结构类型。按照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布划分得到的叫就业的部门结构,按照城乡的分布划分得到的叫做就业的城乡结构,按照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单位分布划分得到的叫做就业的所有制

结构,按照国家各地区的分布划分得到的叫做就业的地区结构,按照就业人口文化知识的分布划分得到的叫做就业的知识结构,此外还有就业的性别结构、技术结构等(姜渔等,1986)。从产业部门的组成来看,有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和轻、重工业就业结构;从所有制性质来看,有国有、集体、个私、外资等不同企业的就业组成结构;从地区来看,有城乡就业结构、不同地区的就业组成结构等。因此,就业结构的划分是依据产业、地区、城乡、技术、性别等的构成进行的。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其中,劳动力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不论生产的社会形态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①。“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与之对应”^②。由于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的特殊地位,就使得因劳动力的不同分布比例而构成的就业结构,在经济活动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同就业结构的功能不同,生产效率也不同。

首先,就业结构合理是经济结构合理的保障,从而使产出最大、效益最高,这是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经济结构合理与否的标志。只有生产要素间达到最优组合,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在考虑诸多生产要素的组合时,应将劳动力要素应置于突出的地位。无论是提高产量还是降低成本,都必须通过劳动来实现。保证各种不同技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知识结构的劳动力合理配置和分工,才能使人尽其用,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其次,就业结构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的转变。从总体上来看,就业结构从属于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姜渔等,1986)。但是就业结构有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反作用于经济结构。比如,劳动力的供给充足程度是决定就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企业雇佣劳动力会更加困难,由于雇用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发展受到限制,就有可能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部分岗位员工缺乏,比如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缺乏高级技工,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最后,就业结构的变化还影响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就业的部门、地区、职业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收入差异和水平。落后的部门、地区以及技术性较差、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低。而新兴的产业部门、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专业化部门、劳动力求大于供的部门,劳动者的收入高。其中,就业人口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是影响社会收入水平关键性变化,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所说,额外的非农就业机会必然会提高劳动力的实际收入(克鲁格,1995)。如果在先进部门、高收入行业的劳动者比重提高了,那么社会的总收入水平就会提高,消费水平也会随着提高。即使是同一行业的劳动者,由于分布的地区不同、工作的城市不同,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44.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85。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2.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85。

2. 就业结构转变

就业结构转变,即就业结构的变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地区结构等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的转移过程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劳动者收入、技能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就业结构的转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

就业结构的转变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无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分析现实问题中从产业部门的组成角度来探讨就业结构转变都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因为产业结构演进本身代表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表现,有比较明显的规律可循。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角度来看,最著名的理论有基于工业结构演进的霍夫曼定律和配第·克拉克定律。由于前者仅限于讨论工业内部的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研究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有一定的差异,不是本研究的重点;而后者无论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方面,还是在实践中的适用性方面都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是本研究的重点。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重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剖析,提出“三次产业”划分思想,把经济发展解释为三次产业产生、发展及相互地位发生变化的过程(Fisher, 1935)。

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关于收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学说以及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划分思想的基础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同产业间相对收入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结果,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呈现出第一次产业人数减少、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人数增加的格局。克拉克写道:“实际人均收入的高水平总是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高比例有关;而实际人均收入的低水平又总是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低比例和第一产业高比例相关”(Clark, 1940)。为了方便起见,人们把此总结为就业结构从“一、三、二”到“三、二、一”的发展进程,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三次产业间相对比重和地位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过程,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遵循这样的规律。

在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变,非农就业比重不断提高^①。非农就业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被称为非农化过程,简称非农化;非农就业劳动力在总就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的高低称为非农化水平,是衡量非农化进程的主要指标。从我国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来看,在一、二、三次产业中农业劳动力占多数,农

^① 非农产业指除第一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变是今后就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形式。而且,在人口不断增长、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非农产业不仅是增加就业机会的最佳途径,也是提高人均收入的最好方式。因而,本研究主要对就业结构在三次产业间以及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转变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中也会涉及其他形式的就业结构变化。

3. 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

就业结构的转变如何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urbanization),又称城镇化或都市化等,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也是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由于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的发展才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因此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得到了城市化研究者们的普遍重视,从工业化角度来看待城市化向来是城市化研究的一大主流。有人认为城市化的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农业活动比重逐渐下降、非农活动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周一星,1995)。从地域和空间的角度定义城市化的内涵是地理学特有的角度,中国地理学者宁越敏(1998)认为,城市化主要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从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空间集中的过程。这一空间集中的过程包括新城镇的诞生,也包括老城市的空间扩展以及内部生产要素、人口向更集约的空间集聚、转移。社会学则认为,城市化是城市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镇中,并被纳入城镇的生活组织中,使城镇生活方式不断得到强化。社会学家罗西在社会科学词典中以综合的观点对城市化下的定义包括四个含义:①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②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③人口集中的过程;④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许学强等,1988)。

城市化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口的城乡迁移,因而从人口的角度对城市化下定义是各类学科普遍采用的方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城市化是城市 and 乡村之间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Kuznets, 1971)。埃尔德里奇则进一步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意义”(波谱诺,1999)。对城市化内涵的概括以美国的弗里德曼提出的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最为深刻。他认为城市化Ⅰ是人口及非农活动在不同规模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和非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城市化Ⅱ是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在农村地域扩散的过程。作为物化了的实体性过程,城市化Ⅰ是有限的;而作为抽象的精神过程,城市化Ⅱ则是无限的(Friedmann et al., 1978)。

由此可见,城市化是一个多维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也应该是由多方面要素组成的。已有很多人为此设计了不同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李振福,2003;林泉,2001;张耕天,1998)。但是,一方面由于综合性指标比较复杂,不同指标体系不一致,使用不方便,不直观;另一方面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人口的迁移,人口迁移伴随着城市化的整个过程,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是城市化水平提高最显著的标志。因此,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通用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是今后城市化的主要形式,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比较切合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质。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和人口遵循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次转变的基本规律。从劳动力和人口自身来看,就业结构转变和城市化是高素质、高技能劳

动者比例逐步提高,而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能劳动者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就业结构转变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结构转变,两者关系的变化无法脱离经济发展这一范畴。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就业结构将持续转换,并带动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首先,就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没有就业结构的转变就没有城市化。从人类步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产业革命所显示的强大力量为经济增长注入了不竭的能量,并激发产业结构随之发生转变。在产业结构转变的带动下,劳动力逐渐由传统产业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生产资源、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对称,但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这样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就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结构的转变,在行业间和区域间发生转移,并相互联系。城市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等非农产业的集聚地,城市以其强大的规模优势、集聚优势 and 创新能力源源不断地提供更高收入和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就业机会,促成了劳动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并带动了劳动力家属等相关人口的城乡转移,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因而,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就业是城市化不断提高和发展的标志,如果就业结构不变,人口在城乡间的转移就业就失去了动力。城市是否能够提供的足够的就业机会是决定人口迁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城市化是否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次,就业结构的转变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除需要转变就业结构外,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如果非农产业主要在农村分散布局,即使实现了劳动力就业的行业转移,仍无法实现其在城乡之间的空间转移,因而不能直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乡村工业遍地开花,出现了村村冒烟的景象。乡村劳动力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非农劳动力比重迅速提高。但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却很缓慢,因而,出现了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即使当地政府做了种种努力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培育城镇,但直到目前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如浙江、江苏等,城市化滞后现象依然存在。

第三,非农就业水平是衡量城市化是滞后还是超前的主要依据。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速度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其中非农就业水平是衡量城市化水平最直接、最有效的标准,一定的城市化水平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非农就业水平。非农就业结构转变的速度以及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是衡量城市化速度最直接、最紧密的指标,城市化发展速度一定要与就业转移速度相适应。

第四,城市化有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就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城市化诸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转移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衡量城市化发展速度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与就业结构相比较,还可以与土地利用的速度、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建立的完善程度等相比较。可持续的、稳定的城市化不仅需要与就业结构的转变相协调,而且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土地的利用、生态环境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建设用地的拓展仅是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城市化的实质,不能简单地用建设用地的拓展规模和速度来判断城市化的速度。当城镇建设用地拓展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用地规模,提高用地的利用效率,避免土地资源

的浪费,使土地的利用与城市化的发展相协调。城镇土地扩展和城市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无法通过建设用地的拓展速度来判断城市化的快慢,说明土地利用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土地资源异常紧张、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的中国。

4. 就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不协调的表现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目前已经成功实现转型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我国是一个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社会,既有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也有先进的现代工商业部门,处于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经的过渡形态(王梦奎,2004),城市化是绕不开的发展之路(李景国,2003)。从1949年算起,为了成功实现这一转变,到2006年底我国已经走了58年的历程。即使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也走过了29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伴随这一过程,城市化水平也由当初的不足20%,提高到2006年的43.9%。城市化水平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提高,根本的原因在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城乡间人口的分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就业结构转变不仅带动了农业人口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的转变,同时使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思想观念、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然而,不是所有的转变都能够带来好的结果,转变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条件是:就业结构转变和城市化要相互衔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如果就业的转变和城市化不能有效衔接,二者的发展就会脱节,就会产生诸多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如果就业结构发生了转变,而人口转移滞后,人口城乡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可能产生三种结果:①城市经济发展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得不到来自乡村劳动力的补充,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受到限制;②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提高,严重制约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③虽然就业结构发生了转变,但非农就业主要在乡村,乡村非农产业分散布局,不仅土地严重浪费,而且对环境造成破坏,使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假定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大规模迁移的情况下,就业结构转变不顺畅,与城市化无法衔接,也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①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城市却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增加,甚至在城市出现贫民窟,产生过度城市化现象;农村劳动力无序进入城镇却找不到就业就会,造成就业紧张,城镇失业率上升(例如拉美的一些国家);②人口大量无序流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造成农村地区劳动力短缺,使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出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凋敝的现象,农村衰落;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加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和法律执行等方面仍存在种种问题,使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不稳定,没有保障,处于社会的边缘,由此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后果。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不仅能够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而且在城市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生活、社会文明和公共服务。当这种愿望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还面临新的威胁的时候,诸多社会矛盾就会显露出来。

三、相关研究评述

1. 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相关理论

对就业转移与城市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把两者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国外学者很早就关注劳动力在地域间的转移,即人口就业迁移与城市化。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列文斯坦就提出人口迁移的八大规律。但是,理论创立最重要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有以“推-拉”理论为代表的系统分析模式和以城乡二元理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模式等。

在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理论中,“推-拉”模式是经常被提到的。该模式于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最主要的思维方式。该模式从系统的角度将影响人口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因素划分推力、拉力、反推力和反拉力四组。一般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把农村人口拉进来,“拉因”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乡村经济破产使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膨胀,“推因”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许学强等,1996)。虽然“推-拉”模式对理解不同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方向有很大的帮助,由于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应用中该理论显得太过简单。另一个系统分析理论是1970年马卜贡杰提出的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该模式认为人口迁移的原因不仅在于移民本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和城市的控制性次系统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制,这是控制移民数量的主因(Mabogunje, 1970)。马卜贡杰认为他提出的系统分析模式比“推-拉”模式好,不仅能分析城乡控制性次系统和调节机能,还考虑了各种系统之间的联系,包括正负反馈和信息流动。该模式的价值主要在于不仅要关注移民本身,而且要关注其对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该模式比较复杂,实际研究中用的并不多。

最著名的理论莫过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Lewis, 1954)。二元经济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经济部门;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生产部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依赖现代部门的吸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劳动力不断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同时,该理论模型把现代部门与城市相统一,在理论中城市化几乎成了工业化的同义语,把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经济发展统一起来(王学真等,200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把劳动力从低工资—低产出的部门转移到高工资—高产出部门。这一理论的建立为研究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思维方法,在人口流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完整的分析体系,一举确立了该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

但是这一理论与社会现实还有很大差距,之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对二元结构模型进行

了发展,强调了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转移的意义(Fei et al., 1964)。他们认为刘易斯的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视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农业劳动力向现代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他们还认为,刘易斯在低估农业部门重要性的同时,也未看到人口增长和资本密度对剩余劳动力吸收过程的实际影响,有鉴于此,费景汉和拉尼斯指出,要实现刘易斯描述的那种转换机制,农业必须同工业一样保持增长。费景汉和拉尼斯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①农业增长同工业增长同样重要;②农业和工业应当平衡地增长;③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必须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经过发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之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城乡收入差距成为人们研究人口城乡流动的主要着眼点,却很少考虑城镇的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 et al., 1970)提出了一种把城镇就业率和失业率考虑在内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即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下,一个潜在的迁移者不只考虑两种工作的实际收入差异,还必须考虑一定时期里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高报酬工作的就业机会或就业概率。因此,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自托达罗模式建立至今,以其广泛的适应性和解释能力一直占据着人口流动理论的支配地位,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流理论模式。

对就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量化研究最著名是钱纳里等(1988)的开创性提出的定量模式。他们认为就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和城市化都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且是有规律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在基本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资源配置、要素使用和其他结构特点方面发生一致的变化。1975年钱纳里等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合并数据(pooled data),通过回归模型计算,提出就业结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一般对应关系(表1-1),成为研究就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参照系。

表 1-1 钱纳里模式中人均收入与城市化和就业结构的对应关系

项 目	人均收入/美元								
	<100(中值)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1000(中值)
非农就业比重/%	71.2	65.8	55.7	48.9	43.8	39.5	30	25.2	15.9
城市化水平/%	12.8	22	36.2	43.9	49	52.7	60.1	63.4	65.8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思·赛尔昆. 1988. 发展的形式:1950~1970. 李新华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注:人均收入按1964年美元计。

2. 我国学者对相关理论的应用和进一步探讨

国内对城市化和就业转移的研究起步较晚,第一篇关于城市化研究的文章是1979年

南京大学吴友仁先生发表在《城市规划》上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此后关于城市化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如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然而,理论上的建树却不大,能够被称为理论模式并得到认可的更加少见,大多是应用国外理论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

作为一个城乡发展差别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理论在分析我国城乡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中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借鉴该理论,结合中国具体问题,主要针对我国乡村工业化的兴起,有人提出了多元化论,其中主要有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劳动力转移的三条途径和两条城市化道路等。有人在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把乡村工业部门作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又一元,把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乡村工业转移的过程看作是在城市以外的乡村区域出现的一个类似刘易斯所描述的另一个二元结构——传统农业部门与乡村工业部门(李克强,1991;陈吉元等,1994;赵勇,1996;方军,1999)。因而,他们认为我国是一个三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在这个三元结构中,乡村人口的职业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传统农业部门向乡村工业部门的转移;另一种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在三元结构中,人口地域迁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乡村到小城镇,二为乡村到城市。此外,根据就业是否发生空间位移,把就业转移分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模式。蔡昉(2000)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角度把农民就业转移分成行业转移和地域转移两个过程,并认为农民职业的转变只是地域转变的一个前奏,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表现为两个先后继起的过程,前一过程只是后一过程的准备。

就业转移的多元化推动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多元化发展,城市化道路模式的研究成为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孟晓晨(1992)提出了单轨、双轨和三轨城市化途径。辜胜阻(1995)认为我国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投资进行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地方投资和农民投资进行的农村城市化。谢晋宇等(1993)把两种城市化称之为计划城市化和自发城市化,并对这两种城市化的机制进行了对比,而刘传江(1997)则把这两种城市化称之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城市化,对比了两种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崔功豪等(1999)认为,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态和存在着的庞大的农村工业背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呈现出二元化,即城市地域以经济和人口集聚为特征的扩展型城市化和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间的转化和以农村城市(小城镇)的建立为特征的集聚型城市化。樊杰(1998)基于我国6省7镇的实证材料,重点分析了农村工业对城镇化的贡献,并认为农村工业改变了农村,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改变产业结构的同时,还改变了就业结构,乡镇企业的建设扩大了镇与更广大地域相互联系的范围,使农民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外,还有人就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称之为外向型城市化(薛凤旋等,1997)。

周天勇(2001)对哈里斯和托达罗模型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和看法,认为模型存在着很大的缺陷:①哈里斯和托达罗模型没有对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收入作差异化的微观个人化分析,经过调整得到的农村流入城市劳动力的预期收入与他在农村的预期收入比托达罗分析的要大;②哈里斯和托达罗模型忽视了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相对应的行业结构,有些行业由于城镇劳动力不愿参加,农村劳动力的加入对城镇失业的影响很小,并不影响城镇劳动力的就业;③由于农民(指中国农民)在农村实际工作的时间比率很低,其外出打工造成的空白完全可以由家庭其他成员替代,外出的机会成本几乎

为零,这一点哈里斯和托达罗模型也没有考虑到。因此,他认为托达罗等给出的控制人口流动、投资向农村倾斜的政策是错误的,分散化扩张就业容量的代价太大,应该走集聚型的发展道路。

哈里斯和托达罗认为越是贫困的地区应该具有越强的迁移动机,因而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来,这与我国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相矛盾,即劳动力转移最多的并不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不是最贫困的农户(Du, 2000)。这种结论印证了拉尼斯和费景汉的研究,即顺利的城市化必须是农业与非农业的同步发展。因为最贫困的地区和最贫困的农民没有起码的迁移资源以支付必要的迁移成本,所以迁移的困难大,人数少。但也有人对此种解释持怀疑态度,蔡昉(2001, 2003)认为这种解释只对一小部分最贫困的农民来说成立,去解释所有的统计人口则不成立,他认为人口迁移率与收入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人口迁移呈随意的排列。赵耀辉(1997)提出那些具有最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的转移领域是农村非农产业,而不是城镇,这是因为这些人在农村也能获得比较高的收入。此外,许多研究者给予迁移者的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以高度的重视。有研究认为,在中国,迁移者获得有关迁移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由家庭成员、亲戚和同乡等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对迁移而言这种社会网络甚至比物质资源更关键。对于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主要是缺乏必要的信息获取渠道,而不是缺乏物质资源(Du, 2000)。

在“推-拉”模式的基础上,应用系统分析思路对我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行分析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胡兆量(1994)根据列文斯坦的八大规律,结合我国实际在经济因素、人口流向、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以及空间特点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陈吉元(1993)认为城市收入高和农村失业率高分别形成同方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农民进城。辜胜阻等(1994)以“推-拉”模式为基础又提出了更复杂的农村-城镇人口迁移推拉模式,他认为中国农村由于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推力较小,是拉力占主导地位的人口迁移模式。宁越敏(1998)对20世纪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看,两个原因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一是由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庞大的就业机会所形成的拉力,二是由城乡差异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李王鸣(1997)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求的拉力角度对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王雅莉等(2002)应用“推-拉”模式对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影响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主要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李强(2003)运用“推-拉”模式对影响我国农民工迁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六点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结论。他认为,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力;与国际模型相比,有很多因素没有共同点,影响中国推拉力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部分推力和拉力失去效力是因为劳动者的流动和心理发生了变形,譬如,农民对城市的排斥力量置之不理,依然涌入。

通过钱纳里模式来判断我国城市化水平高低的研究很多,比如,张颖与赵民(2003)、郭克莎(2002)、孔凡文与许世卫(2006)等。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很多人在运用钱纳里模式的时候,没有对钱模式中的1964年美元进行换算,造成了很严重的谬误(按照郭克莎以及张颖和赵民的换算,1964年的1美元相当于1997年和2001年的5美元)。孙永正(2003)对钱纳里模式的适用范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钱纳里模式固然以充足的资料显示